

当代中国人婚姻震荡调查

核心提示

一向崇尚“家和万事兴”的古老中国,正遭遇婚姻动荡的冲击。

日前公布的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

“中国式离婚”成为一个今世人关注的现象。国外媒体甚至创造新词“我一代”,分析这个曾号称世界婚姻最稳定的国家离婚率走高的原因。

中国人的婚姻怎么了?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经营维护健康、文明、幸福、安全的婚姻家庭?

社会转型期的婚姻震荡

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年龄段是婚姻平稳期,50岁以上人群离婚率上扬

今年29岁的唐娜,2年前结婚,一年后分手。“婚后我才发现找错了人。婚前,他勇于担当的优点,婚后变成了独断专行;婚前,他善交异性朋友,以为他有‘女人缘’,谁知婚后半年他便出轨!”

“一见钟情,婚了。一怒之下,离了。”北京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处近年来登记的离婚夫妻中,35岁以下者超过一半。其中,“80后”又占多数,“闪离”现象日益突出。“有些人办手续时还在吵架,等拿到离婚证后,又抱在一起痛哭。”

不仅“80后”的婚姻多生变故,他们父辈一代的婚姻也亮起红灯。“现在孩子大学毕业可以自立了,家庭责任已经完成,不再彼此凑合了。”年逾50的项先生叹道:“结婚近20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北京宏健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文旭说,他代理的离婚诉讼案中,中老年人约占三成。

“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环境变化对婚姻家庭发起的挑战,‘新离婚时代’来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婚姻从前30年的超稳定型阶段,进入后30年尤其是近年来的动荡时期。

统计数据表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近5年来增速明显,增幅高达7.65%。去年,全国120多万对夫妻喜结连理的同时,196万对夫妇劳燕分飞。目前,北京、上海的离婚率已超过1/3。

从年龄结构看,22-35岁人群是离婚主力军,36-50岁婚姻相对平稳,50岁以上离婚率迅速上扬;从教育背景看,学历高低与离婚率高低成反比,学历越低,离婚率越高,学历越高,离婚率越低。

陈一筠表示,离婚率的提高,反映了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给个人生活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与自由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人际矛盾与情感风险。

“我国的婚姻趋势,发生了与西方国家趋同的现象。”陈一筠介绍,婚姻家庭大规模的动荡趋势,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美社会。

“在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时代,一夫一妻制还适合富裕起来的人们,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享受吗?”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出质疑。于是,西方掀起一场所谓“性自由”、“家庭革命”的社会文化浪潮,那就是同居文化、不结婚文化、不生育文化、离婚文化。他们的初衷就是希望现代人,可以有更好、更方便、更自由、更快乐的生活方式。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股思潮“东渐”中国,给我们这个号称世界婚姻最稳定的国度带来巨大变化。

传统婚姻赖以维系的外在纽带脆弱

现代婚姻更多的是靠情感、心理、文化等内在纽带凝聚夫妻

作家池莉说:“家庭一直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地带,是一个改弦易辙与时俱进最快的世界。”当中国社会历经30多年的发展变革进入转型期时,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会怎样“与时俱进”地“改弦易辙”?

“30多年前,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加上‘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的观念和宗法制的群众监督,外在纽带对婚姻的稳固起着巨大作用。”陈一筠说,“那时候,结婚是一生的大事,一辈子就一次。从来没想到结了再说,不行到时再‘跳槽、换届、优化组合’。”

如今,男人有小金库,女人有私房钱,谁也不再离不开谁。一般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血缘维系婚姻的纽带也脆弱了。“陈一筠认为,‘更重要的是爱情观变了。今天的电影和流行歌曲在传播什么?‘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过去说不清楚,组织上要给你调查清楚。现在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渗入婚姻家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再追求天长地久。一个人有了婚外情,只要不去贪污、受贿,就没有人追究,成隐私问题了。”

社会转型期,婚姻困惑时。当血缘纽带、经济纽带、传统观念和环境纽带等传统婚姻赖以维系的重要外在因素解绑时,现代婚姻的凝聚力在哪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世界很无奈。”公司职员小张善于跟妻子沟通难,“我们俩在一起很郁闷,话不投机就吵架,我宁愿留在办公室跟同事们多聊聊,也不愿意回家面对她。”



聊聊,也不愿意回家面对她。”

“我老婆其他方面还可以,就是版本不够,内存太低。”公务员小李遗憾夫妻间文化差异。

“过去,一位教授娶一个农民,一样过一辈子。今天,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发生转移,更多关注夫妻心理和谐、文化般配、性生活的满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两性问题专家李银河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几代人完成核心家庭转变,即以亲子关系为轴心转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在以往家族主义浓厚的空气里,婚姻起着父母侍奉、宗族承继的功绩,而在“核心家庭转变”过程中,夫妻双方的感情越来越为个人所看重。

“现代婚姻更多的是靠情感、文化和性等内在纽带来凝聚夫妻,这样的婚姻关系被称为‘心理-文化共同体’。”陈一筠认为,与传统模式相比,它文明得多,进步得多,也脆弱得多。

为什么脆弱?富裕考验人。“经济的发展,实实在在考验着人的素质的提高。当人没有建立起自律能力的时候,他律就松弛了。”陈一筠举例说,深圳一公司老总的女夫人找他咨询,后悔不该把自己的丈夫从四川绵阳的山沟里拉到深圳来当老总。“他发了财,心就不在家里了。我现在多么希望把他再拉回那个穷山沟里,‘你挑水来我浇园’。”许多女性都希望丈夫发大财,可是你要掂量一下他的素质。

责任考验人。“现在很多人强调自由多,却忽略甚至远离了责任。”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孙云晓分析,他们非常重视自我利益而很少关注别人的感受,经济上的算计和功利主义是其离婚率高的更深层原因。

环境考验人。陈一筠说,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在内的社会流动增加,工作紧张,出差频繁,夫妻相处时间缩减,再加上社会交往的扩大,娱乐场所的开放,异性结识和沟通的机会增多了,婚外情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离婚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姻家庭的解体造成的痛苦更严重,它使孩子受到伤害,单身母亲的生活陷入困境,给社会底层承受力最差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

恩格斯说,任何维系“死亡婚姻”的做法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道德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社会越进步、开放、民主,给予离婚的宽容就越多。但是,离婚毕竟是婚姻破裂的结果,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离婚的最大受害者是子女。”陈一筠说,很多不幸婚姻中解脱的夫妻,疏忽了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无法从中解脱的是孩子。他们内心的创伤往往终生难以平复,他们的担忧感、不安全感、恐惧感也许永远无法医治。

北京市曾对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进行过一次心理测试,结果显示,至少20%的学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再对这些孩子的家庭进行追访,发现其中65%的孩子来自“问题家庭”,父母不和、分手或者分手过程中的“战

斗”,给孩子心理留下创伤。

国内外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一定程度上讲,在同样的媒体影响、社会环境、学业压力下,哪些孩子更容易患心理疾病,更容易犯罪,就看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家庭问题。”孙云晓说,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双方的关爱,缺少这个环境,他们就会出问题。如果说爱情确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但是有了孩子,这个婚姻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孩子。

离婚的受害者其次是女方。北京市曾对100多对35岁以上的离婚夫妻做过一个5年跟踪调查。这些家庭都有1个或者2个孩子,分手时,85%的孩子判给了女方。5年之后,男方大多再娶,而女方再度进入婚姻的不到15%。

“拖油瓶”的中年女人再嫁谈何容易。”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会长朱明娟说,她们又当爹又当妈,心理透支、情感透支、时间透支、健康透支,一些人还经济拮据。因为离婚时男方尽管给一定的抚养费,但是这个费用没有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孩子生活学习费用逐年增加的因素。所以,不少女性发现离婚是从一个陷阱掉入另一个陷阱。现在都市里增加了一个新的弱势群体——贫困单身母亲。

那么,离婚对男方是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最好办法?一项对5000个离婚者的调查显示,5年后,2/3的男性表示后悔,婚外情成为婚姻的最大“杀手”。

就在国人遭遇近年来婚姻动荡冲击时,西方宣称那场持续30多年的“性自由”、“家庭革命”探索并不成功。2009年,《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婚姻家庭的解体造成的痛苦更严重,它使孩子受到伤害,单身母亲的生活陷入困境,给社会底层承受力最差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日前,美国最新畅销书《定终身》把婚姻定义为,“不仅是个人的爱情故事,也是最严格的社会和经济契约。”

幸福婚姻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

“婚前瞪大两只眼,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婚恋讲堂、情感诊所、婚姻家庭咨询师的出现,使得社会救济成为可能

一位心理学家说:人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成功能够弥补婚姻家庭的失败。很多人在事业上卓有成就,在婚姻上却一筹莫展。恋爱、择偶、结婚、生育女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今天有多少人交了合格答卷?

“怎样经营感情,怎样维护感情,怎样爱情存款,现代婚姻家庭关系已经成为一门学问。”陈一筠表示,“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

“当下,我国各个行当都讲究岗位准入证,做保姆、钟点工都要培训。遗憾的是,唯有两门最重要的职业例外——做夫妻和做父母,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学历教育。”陈一筠指出,多数夫妻没有岗前和岗位培训,缺乏现代婚姻家庭观念和技能的指导,不能很好地胜任各自角色。

“保卫婚姻”从教育开始。对于个人,要有学习的紧迫感;对于社会,要发挥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力量,加强宣传教育,学校应该开设相关课程。”朱明娟介绍,为推进新型家庭文化建设,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全国32个城市启动“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开办“婚姻家庭文化大讲堂”,传播新知识和新技能。

“婚前瞪大两只眼,婚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讲堂”主讲陈一筠传授家庭和婚姻的“秘诀”。

婚前看什么?首先是“新门当户对”。它不是指门第、金钱,而是文化层次,包括相似的家庭文化背景和相当的受教育程度,这是婚后交流的基础;第二,价值观的认同。同事之间可以以价值观不认同,但夫妻就一定要认同;第三,夫妻角色观念的认同。男主外女主内或男主内女主外,只要双方都认可这样的角色分配,婚姻幸福指数就会高;最后,还有性格的互补。“瞪大两只眼”看清这些后,也要看清他(她)背后的家族。

婚后要懂得,戴上结婚戒指,就是给“探索不止”画上句号。“相见恨晚”之后还会有“相见更晚”,浪漫激情不等于幸福家庭。婚姻是相互扶持、相互拯救、同舟共济,需要理解和宽容,夫妻从爱情到爱情的关系最牢固。

“将婚姻进行到底”还需要情感诊所。”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表示,漫长的夫妻生活中,哪有不生病的婚姻,可惜缺少情感医院。建立婚姻家庭咨询和社会救济机制势在必行。

这方面,国外许多国家已在积极行动。美国近日推出“健康婚姻”计划,鼓励人们选择离婚前,参加婚姻咨询和培训,最终再决定是否分手。韩国实施“离婚熟虑制”,法院接到申请离婚后,不立即受理,而是给出一定时间要求夫妻重新考虑,有子女的家庭是3个月,无子女家庭是1个月。

目前,兰州、上海率先试点“离婚劝和”机制,北京出现“婚姻家庭咨询师”,开始婚姻家庭社会救济的探索实践。据《中国新闻周刊》

新闻时评

南科大被收编之正路与歧途

近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公开表示,教育部支持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改革都必须依法办学。此语一出,引得各界猜测纷纷。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分析,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前日,南科大学网站上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被高考”而求助,集体表示不参加高考。(6月1日《新快报》)

南科大通过自主招生,已招到了自己想学的学生,而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正如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所说,将颠覆南科大树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事实和结果可能是,不出一些人的担心,南科大改革偏离既有的设计,政府部门逐渐把南科大的招生纳入统一招生并

授予南科大学学位授予权。如此一来,南科大就会被收编为体制内的一所普通学校,“去官化、去行政化”的改革承载将得不到保证,从而难以突破现有体制对办学的局限。

一所大学的改革之路是如此艰难,不由不让人扼腕叹息。南科大自其出生的那天起就亮出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旗帜,这是南科大的办学特色和努力方向,也是南科大引领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一种信念,推动南科大前行,改革者为此做出了最大隐忍,付出了最大牺牲,而今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种习惯势力却要强行将他们拉回旧体制中去。

南科大之所以为南科大,就在于其图其大者不顾小节,在于其改

革、实验本意。一切的创新实践,都是为教改探路,都是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寻求经验。正如朱清时所言:“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南科大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成功的一流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

到底什么是大学的正路,什么是歧途,人们会有相异的想法。观照“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念,应是能出一流人才的大学,才是走在办学的正路上。一流大学,不能没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质。大学之博大精深,不在别的,在于有大师,在于它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冯友兰先生曾说,一个大学可说是独立

的,“自行继续”的团体。所谓“自行”就是一个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应该由它自己决定、支配,也就是由它自己谈论、批评。大学是要培养出合乎理想的人,而不仅仅是培养出“器”。

南科大的一切改革与探索,都是在尊重教育规律,都是在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钱学森之问。所谓改革,无非是欲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或曰回归大学本位,做那些一流大学都在做的事情。所谓探索,无非是走现实语境中别的一流大学都没走的路,“先行先试”,多向前迈一步。南科大的前程是凶险还是在未来柳暗花明,只能是且走且说。既不过度悲观也不过度乐观,坚持到最后,是改革者的唯一选择。今语

税改意见不能被“沉没”

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修正案征集意见已于6月31日结束。根据中国人大网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已收到23万条意见,创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新京报》6月1日)

报道称,23万条意见基本集中在个税起征点进一步提高等焦点问题上,但与民意相反,专家认为个税征额3000元较为合理,也为今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留下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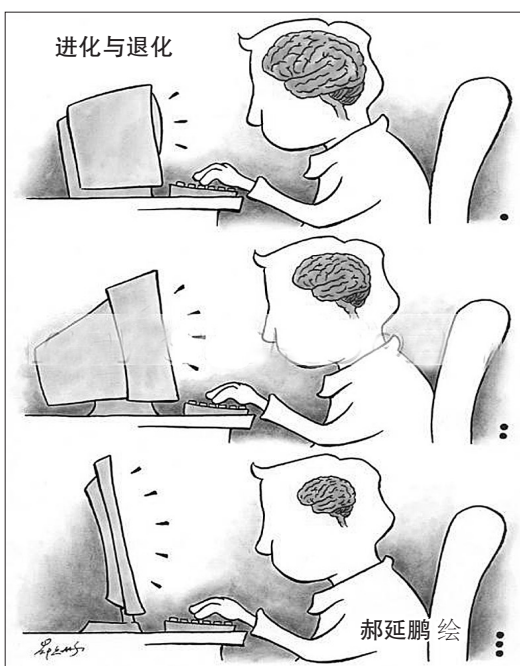
听到专家这番话,难免让人产生有意见“说了白说”的感觉。诚如《南方都市报》社论所言:征求意见是为了吸纳民意。征求意见没有结束之前,国税总局一位负责人就表态说,个税没有考虑地区差异

和实行按家庭征收。这就让人困惑了,个税修正案未经人大审议之前,应该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行政部门已经确定,又何必兴师动众地征求公众意见?

当然,23万条意见不一定都具有可采纳性,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对此,决策者不能忽视。就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所说:因为“听见与被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

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重视和采纳23万条意见,就是对民众发言权的尊重,也是站在更高起点上建立现代文明的一个起步。

更何况,这23万条意见还是人大专门征求的,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如果绝大多数人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个税二审方案就该充分采纳民意。如果对民众的意见置若罔闻,任其自然成为“沉没的声音”,就会打击人民提意见的积极性,让人感受“说了白说”。作为民主法治国家,人民如果一味地“说了白说”,法治也就成了摆设。闻名



防止“以邻为壑”的治安



5月31日,广东东莞市公安局举行了第六场“在线访谈”活动,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回应称:“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东莞警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路面防控和治安复杂场所、地域的清查整治。”(6月1日《广州日报》)

“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这话虽然只是讲客观现象,但不乏有些抱怨。深圳警方有考核任务,东莞警方也有考核任务,也有治安压力,有如此抱怨也是情有可原。

“诸侯治安”在此暴露无遗:维护治安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并不是全国一盘棋,各地警方通力合作,而是打着“守土有责”口号,“各人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甚至是“以邻为壑”。如此治安也着重于简单的清理、驱赶,而不是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消除社会治安隐患。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到底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有什么法律依据,凭什么将一部分公民判断为“治安高危人员”?其二,“治安高危人员”判断的程序又是怎样,能由警方单方面来判断吗?

治安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包括警方在内的多个部门做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搞好。将“治安高危人员”驱逐出管辖之地,即便是真正驱逐了“治安高危人员”,但如果产生治安问题的土壤没有变,治安形势仍然得不到好转,而且,等运动过后,这些“治安高危人员”仍然会再次流入进来。并且,即便成功驱逐了“治安高危人员”,一时一地的治安形势有了好转,但由于“以邻为壑”,其他地方治安压力加大了,就全国而言,治安形势并不能真正好转。

看来,要防止“以邻为壑”的治安,光靠东莞警方与深圳警方隔空对话是不行的,上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应当认识到这种治安思维的危害性,应当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要鼓励他们对治安做长期、艰苦的努力工作,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搞驱逐“治安高危人员”。

文/杨涛 图/唐春成